

孙中山关于官员队伍建设观点的认识

刘仕平

(北京师范大学,北京:100875)

摘要:国家行政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。在孙中山看来,行政官员必须有服务意识,必须诚实,必须通过考试录用,上任时必须宣誓。

关键词:孙中山;行政官员;现代化。

中图分类号:K258.19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3370(2003)04-0082-03

国家官员队伍的现代化,国家行政的现代化,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,并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没有这个现代化,真正的现代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。为此,许多中国人在苦苦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官员们,其工作的性质应该是什么?他们应该怎样看待手中的权力,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?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民,应该怎样要求、培养、锻造自己的行政官员队伍?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,回顾和整理孙中山的思想成果不无裨益。

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三大伟人之一,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。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,他奋斗了整整一生。如何实现国家行政的现代化,如何建立一支优良的行政官员队伍,是他现代化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方面,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重温他的论述,对我们仍有启发和教益。

一、作为官员,必须得牢固树立服务观念

孙中山这一思想根源于他对现代国家的理解。他认为,国家形态是变化的。封建时代,“专制君主,本弱肉强食之兽性,野蛮争夺之遗传,以一人而享有天下,视亿兆为臣仆,生杀予夺,为所欲为。”^{[1][p185]}现代国家与此相反,“民国如公司,国民如股东,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,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。”^{[2][p55]}担心人们不理解,他进一步解释说,“试以经营商业为例,有东家生意与公司生意两种。东家生意者,由东家一人主持之;公司生意者,由股东多数人主持之。君主国如东家生意,权在君主一人;民权国如公司生意,权在股东多数人。”^{[2][p26]}由于现代国家这样组成,因此,“中华民国之主权,在于国民全体。”^{[1][p190]}“民国者,民之国也。为民而设,由民而设,由民而治者也。”^{[1][p200]}在这样的国家中,“行政首长,凡百官吏与政客议员者,皆此四万万人民之臣仆也。”^{[2][p100]}由于这样理解现代国家,官员的职责自然就十分清晰了。他说,“民国元首,只有服务负责之可言,而非有安富尊荣之可慕,国民当共喻斯义。”^{[3][p285]}袁世凯为害民国时,孙中山率领民众进行了英勇的

斗争,最后,终于使袁世凯命归黄泉。对于这件事,孙中山是这样看的:“总统为行政首长,而国民之曰公仆。今以家事为喻,袁氏者乃一强奴耳。不守其奴仆之分,而凌践主人,进而据有主人之产。主人愤恨不平,义师以起。”^{[3][p319]}就是说,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,袁世凯不过是这个家庭中最大的一个仆人。可是,这个仆人却不好好服务,而是想把全部家产攫为己有。于是主人们气愤而起,把他铲除了。从官员的职责就是服务出发,他教育担任公职的人们,“凡职务无论大小,官阶无论高卑,若不能立志,虽做皇帝、做总统,亦无事可做;若能立志,虽做一小官,做工人,亦可成大事。”^{[3][p342]}他一生都要求人们,“要立心做大事,不要立心做大官”^{[1][p263]}，“事功在百世,而权位不过一时”^{[3][p312]}。

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推行了两千多年,专制主义传统既悠久又深厚。在专制统治下,官员是主子,是老爷,是人上人,大权手中握,威势令人寒。相反,老百姓是仆役,是牛马,是草芥,供人驱使,任人支配。封建社会称统治百姓为“牧民”,其意是说,百姓如牛马,治民如放牧。官和民地位之不同,真是如同天地!背负这样的历史传统,孙中山提出官员是公仆,官员的职责是服务,其意义不可低估。说它是中国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,一点也不过份。但是,由于自民国初年就陷入了军阀混战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上也走了不少弯路,中国的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,致使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被彻底肃清。官员没有普遍树立起服务意识,一部分人把做官当成做老爷,甚至认为做了官便可以所欲为,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。它的主要表现有,其一,高高在上,盛气凌人,讲究排场,追求威势,出则车必华,入则随必众,时时求与众不同,处处想高人一等。其二,百姓疾苦,漠不关心,人民冷暖,不放心上,只知讨领导喜欢,一心求上级高兴,对上对下两张脸,作主作奴皆擅长。其三,只求表面热闹,实质从不讲求,一贯形式主义,专会摆花架子,空话套话天天讲,问题一个不解决。以上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是严重存在的,并且从很早起就就要把它们肃清,但每次整治的结果都不尽人意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官老爷了吗?笔者认为办法是有的。第一,深化民选制度,官位决于民

收稿日期:2002-10-31

作者简介:刘仕平(1965-),男,汉族,河北省廊坊市人,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,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、中国军事思想史研究。

意。人民是国家主人。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谁来领导自己。只要实行民选，那些老爷作风十足的人一定会像敝履那样被抛弃。第二，让民众畅所欲言，公开褒贬人物。古人讲，干夫所指，无病亦死。众口能铄金，更何况一个肉体凡胎的人。充分利用舆论的监督作用，对不能为民众好好服务的人给以有力的揭露批评，对克服老爷作风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。从历史的进程看，允许不允许民众自由发表意见，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和它以前的其他社会的重大区别。

二、作为官员，必须得诚实

孙中山曾深刻指出，“谋国不以诚意，未有不误国者”^{[1][p549]}。他主张做事应该坦诚、直率，不要用手段。他坚信“办事不在乎手段与运动之多寡，而贵乎光明正大之主义公理”^{[3][p40]}。民国以后，军阀掌权，施展伪诈，风气日坏。孙中山对此痛心疾首，多次指出，“中国通病，在一伪字”^{[3][p395]}。“国人症结，不独成见。在乎诈伪相乘，各私其属，阳假嘉名，阴图幸利”^{[1][p540]}。孙中山是民主政体的坚定卫士，一生以反专制为职志，但因他对诈伪极端厌恶，护法时期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，“文对于真复辟者，虽以为敌，未尝不敬之也。今张勋虽败，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，其名虽美，其实尤窳”^{[4][p124]}，“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”^{[4][p122]}。孙中山先生认为，作为官员，只有自己诚实，才能“导人以诚”^{[1][p395]}，示范全国，改变风气。

官场历来很复杂。厚道诚实之人，置身其中，常常吃亏受害。在中国语言中，说某某是官场之人，本身就含有道德上的贬义。诚实，对普通百姓来说比较容易做到，对官员来说实在是极高的要求。正因为如此，古往今来的官员，在“诚实”二字之前，若扪心自问，真能内心坦然的，恐怕少之又少。现在干部的不诚实主要表现在：第一，承诺不兑现。上任伊始，新年伊始，大夸海口，大许宏愿，但原本就是说说而已，根本没想认真去落实。事后虽不能兑现，但处之坦然。第二，言行不一。写文章、做报告，提出一大堆高标准严要求。但只是想让别人做，自己从骨子里就没想照办。第三，耍两面派。人前讲一套，人后讲另一套。会上讲一套，会后搞另一套。大伙面前讲一套，自己小圈子里讲的又是另外一套。这些不诚实现象若得不到遏制，将危害无穷。怎样对付不诚实的人呢？笔者认为，办法有二。第一，按言究实。一个人可以不说话，但说了话就要负责任。官员地位特殊，更应如此。说了话，许了愿，就应该允许人们按其言论去查其结果。若说到做到，就是言而有信，为人诚实。若只说不做，言而无信，轻则让其受舆论谴责，重则让其丢官失职。第二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。一个官员是否诚实，是否言必行、行必果，广大群众看得是很清楚的。让人们充分发言，自由评说，就可以有力地谴责虚伪，鼓励诚实。

三、作为官员，其录用必须得经过考试

孙中山指出，作为现代国家的官员，要想为国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就应该具备相应的素质。“当议员或官吏的人，必是

要有才有德，或者有什么能干，才能愉快胜任。如果没有才没有德，又没有什么能干，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，那么将来所做的成绩，便不问可知了。”面对众多的人想当官，“我们又该怎样去断定他们谁是合格的呢？我们中国有个古法，那个古法就是考试。”“考试是一个很好的制度”^{[1][p501]}，“如果有了考试，那么，必要有才能有学问的人才能做官，当我们的公仆”。“凡是我们人民的公仆，都要经过考试，不能随便乱用”。孙中山认为，民国成立后，官场一片污浊，与没有实行考试录人有关。“因为没有考试制度，一些不懂政治的人都想法做了官，弄到弊端百出。在政府一方面是乌烟瘴气，在人民一方面是非常的怨恨。”“由此便可知，考试真是一件很紧要的事情。没有考试，我们差不多就无所适从。”^{[1][p510]}

考试录人，中国人首创，时在隋朝文帝时。为此，西方评隋文帝为影响世界的一百位伟人之一。但后来，这种制度在中国却变得僵化、枯朽了。清末，干脆将其废除。战争年代、革命年代，对干部的专业知识要求不高，因而考试录人不可能复活。随着全面建设时期的到来，对干部资质和专业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为适应新形势，考试录人重又登场。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符合世界潮流。但是我们现在的干部考试也有不尽人意之处。表现之一，文凭水分大，名实不符。这些年选干部，往往有硬性规定，学历就是其一。为了能符合条件，弄个文凭成了许多人十分迫切的事。有求就有供。因有利可图，许多单位搞干部文凭教育。因目的在赚钱，对教学本身根本不用心。结果单位挣了钱，干部得了文凭，两全其美，皆大欢喜。但教育的本意在这个过程中被玷污了。文凭有了，可干部本人的水平、素质并没有提升，这叫什么教育？表现之二，干部培训所讲内容陈旧，受益不大。许多干部多次参加培训，上学的时间加在一起长得惊人，证书也获了许多，但水平却提高不多。这样的培训，效果何在？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？笔者提两点建议。第一，学历教育应该全部归入国民教育系统，党政系统不该搞学历教育。第二，干部培训的内容应该面向世界，面向现代化，面向未来，过时的陈旧的内容应该淘汰。

四、作为官员，就职时应一律宣誓

孙中山指出：“今日文明法治之国，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也”。“中国四万万，实等于一盘散沙。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国家，其道为何？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，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。”^{[2][p212]}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，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，首先庄严宣誓，做了表率。他当时本想要求“文武官吏军士人民，一律宣誓，表示归顺民国，尽其忠勤”，但许多革命党人不同意，故此举没能实行。后来，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。袁世凯对共和制度本来就不忠诚，不想宣誓。但孙中山表示，此事“有我之先例在，决不能稍事迁就”。最后，袁世凯不得不宣誓“服膺共和，永绝帝制”。“其后不幸袁氏果有背盟称帝之举，而以有此宣誓之故，俾吾人以极大之理由以讨伐之”^{[2][p213]}。1920年11月，桂系军阀被逐出广东，孙中山重回广州任非常大总统。在接受《字西林

报》记者采访时,他指出,官员就职宣誓十分重要:“余尚拟行一新例。其始不免遭人反对,即凡百官吏于就职,必发誓奉公守法,不取贿赂。以后有违誓者,必尽法惩治之”。^{[1][245]}纵观孙中山一生,可以看出,他一直认为官员就职宣誓很重要,是必须要履行的一道程序。

专制时代,官员也经常宣誓,但全是对上的,是向上级作保证。孙中山先生说的宣誓与之相反,它是向下的,向那些选了自己、自己应对之负责的民众作保证。从这一点上说,这是

一个全新的仪式。宣誓是一种形式,但这种形式应该搞。长期坚持官员上任宣誓,有利于对权力实施监督,有利于调动民众的参政热情。目前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二。第一是不够郑重。强调宣誓仪式郑重,主要是为了使宣誓者铭记自己的誓言,事后努力去做;同时,也可以增强民众的记忆,使他们根据誓词去核对官员的作为。第二是宣誓内容过于笼统。宣誓内容过于笼统,缺少操作性,可办可不办,群众怎样监督?宣誓还有什么意义?在这两方面,今后应该改进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2]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3]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4]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
SUN Yiesen's View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Troops

LIU Shi-ping

(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: 100875)

Abstract: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is a part of the entire state modernization. According to Sun Yie'sen, The administrative staff members must hold the sense of service and be honest; and they must be examined before taking positions and take an oath of office.

Key words: Sun Yie'sen; Administrative staff members; Modernization.